

毛澤東思想課程學習文件選編

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學院

一九六一年二月

送印单位：政治教研室

出版编号：政字61003①号

完八：油，完九：指、軍、
运、油、財，高干四，參二，

适用范围：速二：卫，完四：營，速一：

海（油），蓮二：海（指、軍）

完十：指

印 数：1—1800 冊（實印）

出版日期：1961年2月25

全书共計：81面



毛澤東思想課程學習文件選編

目 录

一、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

- 1、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第四、五、六、七節（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 2、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 3、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 4、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 第二部分……………（1）
- 5、劉少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8）
- 6、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見農村整風整社文件選編）
- 7、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見農村整風整社文件選編）
- 8、毛澤東同志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九年三月）（正營大尉以上干部閱讀，見農村整風整社文件選編）
- 9、黨內通訊（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見農村整風整社文件選編）
- 10、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一九六〇年八月十日）（見農村整風整社文件選編）
- 11、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公報……………（20）

二、反對帝國主義問題

- 1、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形勢和我們的方針（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 2、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見毛澤東選集）

第四卷)

- 3、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4、毛澤東：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5、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6、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 (22)

三、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

- 1、毛澤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2、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3、毛澤東：論持久戰（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4、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各个殲滅敵人（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5、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第一至三節（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6、毛澤東：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7、毛澤東：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8、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另發）
9、林彪：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43)
10、葉劍英：偉大的戰略決戰 (54)

四、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

- 1、毛澤東：實踐論（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2、毛澤東：矛盾論（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3、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6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摘要)

(1958年5月5日)

刘少奇

二

目前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大躍進，不但是反右派斗争和整風運動勝利發展的結果，而且是正確執行黨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結果。

毛澤東同志反覆說過：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和建設，可以有兩種方法：一種方法是進行得快些和好些，另一種方法是進行得慢些和差些。我們在二者之間將如何取舍呢？鬥爭是存在的。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關於這兩種方法的鬥爭，一九五五年毛澤東同志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著作已經在理論上解決了，而且經過一九五五年秋季、冬季和一九五六年春季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已經在實際上解決了。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也有兩種方法的鬥爭，去年毛澤東同志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著作已經在理論上解決了，而且經過去年以來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也已經在實際上解決了。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上，党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歷來的主張同樣是很明確的，即應該採取快些好些的方法，拒絕慢些差些的方法。但是有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還保存一些所謂“右比左好”、“慢比快好”、小腳走路比大步前進好的陳腐觀念。這個問題上的兩種方法的鬥爭，直到這次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以前，還沒有完全得到解決。

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就已經指出：“中國的經濟遺產是落后的，但是中國人民是勇敢而勤勞的，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共产党的领导權，加上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援助，其中主要的是蘇聯的援助，中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將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當地快的，中國的興盛是可以計日程功的。對於中國經濟復興的悲觀論點，沒有任何的根據。”在制定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候，党中央曾經批判了主張放慢建設速度的錯誤意見。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的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但是党中央認為，這個計劃不但能夠完成，而且可能提前和超額完成。事實上，到了一九五五年冬季，當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顯然將在很短的時間內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群眾性的生產建設的高潮開始出現的時候，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常規”就已經必須衝破了。毛澤東同志及時地提出了號召，要求以更高的速度來代替第一個五年計劃原來規定的速度。他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所寫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中說：

“現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問題，这个問題已經解决了。也不是在資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問題，这个問題也已經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問題，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談一談，这个問題也会容易解决的。現在的問題，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經濟部門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項工作同各种經濟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況估計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們的思想必須适应已經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觀情況所許可的条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現在的問題，还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觀情況的发展。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澤东同志接着把“序言”中所闡述的这个思想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口号，並且指出了全党的迫切任务是要克服实际存在着的右傾保守思想，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設事業中要做“促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以便把我国的工农业生产と建設事業大大地推向前进。

根据毛澤东同志的倡议，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綱要草案”。这是一个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綱領。它不但給全国农村工作指出了一个偉大的奋斗目标，而且給整个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同年四月，毛澤东同志在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議上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要求全党注意正确处理：（一）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輕工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經濟建設和国防建設的关系；（四）国家、合作社和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漢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党内党外的是非关系；（十）国际关系。毛澤东同志的这个报告，为实现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总方針規定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其中的第一項和第五項，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並举的原則，以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互相結合的原則。第二項和第三項，指出了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地集中資金在經濟建設方面。第四項指出了必须正确地处理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消費和积累的关系。其他的几項，主要地是圍繞着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这样一个在后来繼續发展了的觀点。这个报告的总的精神，就是要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把一切可用的力量都调动起来，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設成为現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党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的工作報告，就是根据毛澤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針政策而提出的。

由毛澤东同志提出的上述方針和各种政策，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一九五六年，我国的整个經濟文化事业有一个巨大的跃进。在这一年，工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基本建設工作量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二，农业生产虽然遭到了严重的災荒，仍然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九。这样，我們就在四年的时间內，在工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和

交通运输等方面，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在基本建設方面，也創造了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順利条件。

在一九五六年的跃进中也曾出現了一些个别的缺点，主要是由于多招收了一部分新职工，某些人員的工資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了市場供应情况的某些緊張。这些缺点，比之当时所取得的巨大成績，本来是很小的，經過全国人民在党的号召下进行了几个月的增产节约运动，問題就解决了。但是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却估計不足，因而認為一九五六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在反对所謂“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的方針，农业发展綱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結果是損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生产建設战綫上特別是农业战綫上的进展。但是不久，党就纠正了这个錯誤。在去年九月党的三中全会上，重申了坚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方針。接着，党中央又重新公布了經過修正的农业发展綱要草案，毛澤东同志又提出了十五年在鋼鐵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國的战斗号召。党中央的这些正确的指导，同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群众积极性相結合，才又在更大的規模上产生了目前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全面跃进。曾經对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方針表示怀疑的同志，許多人已經从这样一次反复中得到了教訓，有些人却还没有得到教訓，他們說：“到秋后再同你們算賬。”讓他們等着算賬吧，他們总是要輸的。

一个馬鞍形，两头高，中間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綫上所表現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一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嗎？

馬鞍形教訓了党、教訓了群众。現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滿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繼續提高。他們迫切地要求摆脱技术落后和文化落后的障碍。鑑于經濟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基本上获得胜利的情况，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認為，現在已經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經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輔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曾經多次指出，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应当是“不断革命”。及时地提出新的革命任务，使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不致在中途发生停頓，使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不致因为革命的間断而冷却，使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員不致因为滿足于既得的成就而生长起驕氣和暮氣，——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长时期以来就是用这个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論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还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夜，党中央就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中，明确地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轉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紧接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党中央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就指出了在农业方面通过互助合作运动实现集体化的道路，并且在一九五三年向全国人民大規模地宣傳了对于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党中央又提出了和实行了在思想战綫和政治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有这一切，都使革命不失时机地从一个阶段前进到另一个阶段，从一个胜利前进到另一个胜利。

提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号召，这就是說，我們的不断发展的革命，現在又需要前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这个及时的号召，迅速地受到了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識分子的热情的响应。事实上，人民群众已經行动起来了，在許多地方，征服技术落后和文化落后的偉大的进军，已經轟轟烈烈、蓬蓬勃勃地开始了。

如上所說，在八年建設過程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已經在实践中一步又一步地証明了自己的正确性。虽然这条路綫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繼續考驗，並且使它繼續发展和完备起来，但是我們認為，它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則是可以确定下来了。

根据几年来人民斗争的实际經驗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发展，党中央认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基本点是：調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繼續完成經濟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並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並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並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根据这条总路綫的要求，党和全国人民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在技术革命方面，主要的任务是：把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内的全国經濟有計劃有步骤地轉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轉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使一切能够使用机器的劳动都使用机器，实现全国城市和农村的电气化；使全国的大中城市都成为工业城市，并在那些条件具备的地方逐步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的县城和很多乡镇都能有自己的工业，使全国各省、自治区以至大多数专区和县的工业产值都超过农业产值；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以现代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网和邮电网。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術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机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劳动适当地結合起来。

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經濟建設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它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一般的专区和許多的县都有高等学校和科学硏究机关，完成少数民族文字的創制和改革，积极地进行漢字的改革；消滅“四害”，講究卫生，提倡体育，消滅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开展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培养新知識分子，改造旧知識分子，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員、科学家、新聞記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队伍。

积极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积极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将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发展起来，将要大大地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使我国工业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國；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綱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發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

建設速度的問題，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們面前的最重要的問題，我們的革

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们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我国这样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尽快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必将大大增强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优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互助合作，有利于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的互助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保障。

有些人不認識提高建設速度的重要性，不贊成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提出了这样那样的反对意見。

有些人說，提高建設速度，会使人們“过于紧张”，宁可慢一点好。但是，难道慢一点就不紧张么？要知道，六亿多人长期处在贫穷和缺少文化的状况下，用很大的努力才能勉强維持很低的生活水平，不能有效地抵抗自然灾害，不能迅速地制止可能的外来侵略，完全处于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被动地位，那才是一种可怕的紧张局面。为了摆脱那种局面，几万万人鼓起干勁，满怀信心地投入热烈的劳动和斗争中，這是我們应当双手欢迎的一种革命的常規。这种“紧张”完全沒有什么可怕。毫无疑问，我們应当領導工人农民努力改进技术，改进工具，改进操作方法，改进劳动組織，来实现生产的跃进；必須注意使群众在生产高潮的发展中有必要的休整，使苦战和必要的休整结合起来，使生产建設有节奏地前进，并且注意安全。在几万万人发动起来的大运动中，也难免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发生某些缺点，在向前发展的同时遇到某些困难，甚至是很大的不可預料的困难，這是我們必須估計到的。但是团结起来了的广大人民决不会为这些缺点和困难所吓倒，一定能够及时地克服这些缺点和困难。有人批評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說得正对！难道我們能够不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嗎？难道我們应当好小喜过，絕功棄利，安于落后，无为而治么？

有些人怀疑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針会造成浪费。当然，如果把多快好省这个統一的方針分割开来，只追求多快而忽視好省，或者只追求好省而忽視多快，必然会造成浪费。多和快是对数量和时间的要求，好和省是对质量和成本的要求，它们是互相补充、互相制约的。事实証明，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針，可以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潜在力量高度地发挥起来，可以在整个生产建設事业的发展中造成最大的节约。反之，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針，限制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潜在力量的发挥，就一定要造成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的浩大的浪费。

有些人又担心执行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会在各个生产部門之間，在財政的收入和支出之間，造成不平衡。不平衡一定会有的，不实行这个方針，不平衡也会永远存在，因为任何平衡总是暫时的和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絕對的平衡是没有的。当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經濟按比例发展的客觀規律，在国民经济各部門之間，需要保持一定時間、一定范围的平衡，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計劃工作的任务。問題是采取什么方法去平衡，是使落后赶上先进，还是讓先进迁就落后。要解决財政收支不平衡的問題，积极的方法是发展生产，增辟財源；消极的方法是从片面的財政观点出发，限制建設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四二年所写的“抗日时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一书中就指出了这种消极方法的錯誤，他說：“財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經濟，但是决定財政的却是經濟。未有經濟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財政困难的，未有經濟不发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忘記发展經濟；忘記开辟財源，而企图从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开支去解

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從抗日戰爭時期以來，我們歷次的財政困難都是按照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這個方針而順利地解決了。由此可見，可怕的不是出現不平衡，而是對於不平衡驚慌失措，要求先進向後面看齊，要求削足適履、因噎廢食。

因此，那些反對提高建設速度、反對多快好省這個方針的批評，都是站不住腳的。

為了提高建設速度，為什麼工業和農業必須同時並舉呢？這是由於我國是一個農業的大國，在我國的六億多人口中有五億多農民，他們無論在革命鬥爭中和建設工作中都是一支最偉大的力量，我國工人階級只有依靠這個偉大的同盟軍，把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充分地調動起來，才能取得勝利。農民同盟軍問題的極端重要性，革命時期是這樣，建設時期仍然是這樣。無論在什麼時候，政治上犯錯誤，總是同這個問題相關聯的。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大力地發展農業，這就是動員世界上最大的國內市場對於農業機械、化學肥料、建築材料、燃料、電力、運輸工具等各種重工業產品以及各種輕工業產品提出巨大無比的要求，動員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大軍發展糧食和各種付食品的生產，發展棉花和許多其他工業原料的生產，動員他們貢獻無限的勞動，創造無限的財富，為國家的工業建設積累大量的資金，並且直接在農村發展小型工業。因此，大力發展農業，必將加速國家的工業化，加速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大大有利於改善全國人民生活和鞏固工農聯盟。而如果沒有農業的迅速發展，就不能有輕重工業的迅速發展，也就不能有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這個真理，已經為過去八年特別是今年的事實所充分證明了。

有一些同志擔心，發展農業雖然可以為工業化積累資金，但是目前却首先要分散國家用在工業化上面的資金。前年和今年兩次農業高潮證明這種憂慮是多余的。只要我們善于依靠五億多農民這個偉大的力量，即使國家不增加對農業的投資，也可以使農業建設的規模大大地擴大。八來國家為根治淮河，共投資十四億五千萬元，完成的工程總量為十六億多土石方；而在一九五七年冬至一九五八年春這半年的時間內，僅河南安徽兩省，主要依靠農民自己的勞動力和財力物力，就完成了一百二十億土石方的工作量。

有人懷疑農業生產究竟能不能迅速增長。他們曾經引經據典，證明農業的發展只能是慢慢的，並且是不能保證的。某些學者甚至斷定，農業增長的速度還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他們認為，人口多了，消費就得多，積累就不能多。由此，他們對於我國農業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作出了悲觀的結論。這種思想的本質是輕視我國組織起來了的革命的農民，因而不能不受到事實的反駁。今年我國農業的生產建設的大躍進，不但徹底推翻了他們的農業發展快不了的論斷，而且徹底推翻了他們的人多了妨礙積累的論斷。他們只看到人是消費者，人多消費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產者，人多就有可能生產得更多，積累得更多。顯然，這是一種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

為了提高建設速度，為什麼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业必須同時並舉呢？發展工業生產既然是全國人民的普遍需要，這就必須執行全黨辦工業、全民辦工業的方針，徹底打破那種認為工業只能由少數人包辦的神秘觀點。只有中央和地方各級直至合作社一齊動手，並且在大中小企業方面實行分工合作，“眾人拾柴火焰高”，事情才能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中央和省、市、自治區舉辦一定數量的大企業是必要的。大企業的產量大，技術高，能夠解決國民經濟中有決定意義的關鍵問題，並且成為

带动全国工业发展的骨干。但是中小企业也有大企业所难以具备的优点：投资少，便于吸收分散的资金；建设时间短，投资效果发挥快；可以自己设计和供应设备，便于因陋就简地利用当地各种现成的设备；分布广，利于促进全国的工业化，促进全国技术力量的生长，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可以生产的品种多，改变产品也容易；接近原料和市场，可以灵活地利用资源，节约运输费用，供产销也易于结合；易于按照工作的多少而灵活地使用农村的劳动力和其他非专业的工人，因而有利于缩小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差别。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首先注意了发展中央管理的工业和大型工业，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地方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的发展注意不够，是一个缺点。两年多以来，中央曾一再指出必须克服这个缺点。在改进工业管理的体制和提倡中小型工业以后，各地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大为高涨。只要全国二十几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一百八十多个专区、自治州，二千多个县、自治县，八万多个乡、镇，十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七十多万个农业合作社，都能够在发展工业方面正确地充分地发挥积极性，那末，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各种工厂就会象星罗棋布那样分布在全国各地，而我国工业的发展，当然要比只靠中央管理的若干个大企业快得多。这样，前途必然是：一、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二、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三、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

地方工业的大发展，中小企业的共同发展，必然带来许多新的我们现在还难于预料的问题。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我们所提倡的地方工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的发展，而不是盲目的、自由竞争的发展。为了防止和减少可能的资源资金的浪费和产品的积压，中央和地方各级都必须认真地加强协作和平衡的工作，必须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和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同时，无论在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中，无论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那种片面地追求最新技术而不愿意充分利用一切现有技术条件的倾向，反对那种片面的强调专家的作用而忽视工人农民革新生产技术的偉大作用的倾向。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同那种安于落后，不求进取的倾向，同样不利于建设事业的发展。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应用和发展。把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充分地结合起来，把中央的力量和地方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充分地结合起来，把大型的事业和中小型的事业、提高的工作和普及的工作充分地结合起来，这一切，不但适用于工业，而且适用于其他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适用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整个事业。应当教育党和国家的全体工作人员认真地全面地领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工作中加以贯彻执行。对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工作人员，应当着重地教育他们坚决执行联系实际、联系生产、联系群众的方针，以便有效地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国的胜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为“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雜誌而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刘少奇

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現在，已經有十周年了。

中国革命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繼續。偉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紀元，开始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功，以苏联为主力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欧亚許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都表明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没落是不可抵抗的历史規律。中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革命把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綫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使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制度遭到致命的打击。新中国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營。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結成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在欧亚两洲連成一片、团结友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对于一切曾經遭受过或者正在遭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落后国家的人民，中国革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感觉到，中国人能够做到的，他們也应当能够做到。所有这些，清楚地說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力量对比，已經有了新的变化。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彻底的解放，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能够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从而迅速地改变着中国貧穷和落后的面貌。

中国在全国解放后的最初三年間，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順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使工农业生产一般地达到了和超过了旧中国的最高水平。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国人民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計劃，使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使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四十。第一个五年計劃的完成，为中国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計劃。一九五八年出現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今年又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繼續跃进。同一九五八年相比較，今年工农业总产值，計劃增长百分之二十，工业总产值計劃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农业总产值計劃增长百分之十。鋼、煤、冶金設備、发电設備、金属切削机床、棉紗、原木、粮食、棉花等项工农业主要产品的計劃产量，都将完成、超过或者接近第二个五年計劃原定在一九六二年完成的指标，中国社会生产力这样飞速的发展，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当然更不是在旧中国的条件下所能梦想的。

馬克思說得完全正确：“革命是历史的火車头”。在中国，沒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沒有廢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会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就不会有象今天这样全国人民精神煥

发、意气昂揚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局面。革命給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希望和異常光輝灿烂的前途。

中国人民十年来的胜利，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总路綫、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綫、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的胜利。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毛澤东同志反复地闡明了这样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只有畣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畣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領導中国革命。”（注一）一方面，中国革命中的右傾机会主义者正象俄国的孟什維克一样，他們用一道“万里长城”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隔开，看不到这两个革命之間的相互联系，在民主革命中看不到有把这个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前途。另一方面，“左”傾机会主义者又类似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們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內消滅資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两种錯誤傾向，都會导致中国革命受到很大的損失。同“左”右两种机会主义相反，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方針是：一方面实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論，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明确地区別开来，另一方面，又实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把这两个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尽一切可能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以便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不停頓地立即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无产阶级經過共产党紧紧地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保証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由民主革命胜利地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任何中国的資产阶级政党，都提不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綱領，都不可能把中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就是我們党領導民主革命的总路綫。这条总路綫，按照毛澤东同志的概括，叫做“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注二）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大国，它的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貧农和雇农又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农民問題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旧中国的反动統治是极端野蛮的，人民群众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进步的革命家大批地受到逮捕和杀戮。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深入农村，领导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斗争，达二十二年之久。党采取了坚决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組織力量，发动农民自己救自己、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保卫土地的群众路綫的方針（党的这个方針一直繼續貫彻执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土地改革中），而不是采取与此相反的把土地“恩賜”給农民的資产阶级的方針，就使党在农村中建立了强大的可靠的革命堡垒，建立了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把广大貧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紀律性逐步提高到接近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水平，并且从他們中間取得了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所需要的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后备。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的革命战争，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土地改革和經濟文化建設，实际上是为了准备全国胜利而进行的长期反复的偉大的演习。在这些演习中，教育了群众，鍛炼了军队，积蓄了革命力量，培养了干部，并且使党的

領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經驗。

因为在民主革命中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盟，我們就能够正确地解决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根据中国的情况，我們正确地区别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們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封建主义的保护者和同盟者，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凶恶的敌人，必須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他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排挤，要求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因此，他們有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的可能。但是，他們有软弱性，有革命和反动的两面性，經常处于动摇的中间地位。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联合他們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另一方面，又要同他們的妥协性进行斗争。实行了这样的统一战线政策，我們就达到了壮大革命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的目的，巩固地保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割断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的联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混淆这两个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都不懂得农民問題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而也不能正确地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采取投降主义的路线，把民主革命看成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事情。他們不去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而主要地依靠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并且对于资产阶级只进行联合，而不进行必要的斗争。这样，他們就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情况下，就使革命遭到失败，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挫折。就是在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經成熟，需要抓住时机，进行决定胜负的斗争的时刻，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也不敢爭取胜利，甚至要阻止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联合各种小资产阶级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且錯誤地把中间力量作为主要的打击方向，否認在民主革命中有联合或者中立各种中间力量的必要和可能。他們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进行斗争，不进行适当的联合，更不愿意利用敌人的具体矛盾，集中力量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結果也放棄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使无产阶级陷于孤軍作战，使革命不可能得到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他們都忽视农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毅力，在反动统治时期，不承认我們能够在农村站得住脚，能够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能够经过农村包围城市并在最后达到夺取城市的目的。所以，“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調換位置。例如王明同志，他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人，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左”、“右”两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了全党，从而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使一个革命胜利接着一个革命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彻底地粉碎了旧中国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粉碎了它的压迫人民的官僚机构和军閥机构，从而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偉大的人民共和国，这就順利地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轉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革命的最主要問題即政权問題上，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終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巩固地建立了自己

对国家的政治統治权，因而就不需要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由于我們党在民主革命中一分鐘也沒有忘記我們的最后目的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民主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就十分注意地确立了並且巩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結果。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国胜利前夕，毛澤东同志在党的七屆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国外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而国内的主要矛盾則将由中国人民同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讓位給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的矛盾，並且提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一系列的基本政策。中国人民在全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虽然还必須繼續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在全国很大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来消滅封建地主阶级的任务，但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已經在一九四九年开始了。中国无产阶级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通过国家的力量，沒收官僚资本，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的經濟命脉，积极地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經濟，並且使这种經濟在整个国民經濟中居于領導地位。

在一九五二年年底，当恢复国民經濟和肃清封建殘余的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同时並举的总路綫，規定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任务。在提出这条总路綫的时候，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着偉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我們一方面企图扼杀新中国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团结了全国人民，取得了偉大的胜利；另一方面，在国内，一步不停地繼續进行着社会改造和建設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这条总路綫，是引导中国社会由当时的既有社会主义經濟、又有资本主义經濟、又有个体經濟的复杂的經濟結構，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經濟結構的路綫。当时，有些人否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他們或者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或者企图把革命停下来，长期保持既有社会主义經濟、又有资本主义經濟的現狀。党的这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綫肯定要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否定了从右的方面来的各种錯誤觀點。同时，党的这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綫又肯定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須是逐步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必須是逐步的，从而否定了企图在一个早上就把资本主义消滅得干干净淨的“左”的錯誤觀點。

我們在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点的步骤。

我們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第一步，在土地改革以后，紧接着广泛地发展了在个体經濟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互助組織。这种互助組織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經出現了。第二步，在这种互助运动的基础上，紧接着又发展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經營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和主要的生产資料还是私有的，这种合作社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我們把它叫做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就是实行土地和主要生产資料的集体化，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是我們所說的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农业合作化問題上，我們党内曾經有过不同觀點的爭論。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們工业化水平还很低，还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因此，要很快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这种观点已经被事实驳倒了。我們在基本上没有机械化的条件下，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的任务。

有一种观点，认为迅速实现合作化，势必降低农业生产。这种观点也被事实驳倒了。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和合作化以后，我国的农业生产不但没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并且上升得相当地快。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們这样迅速地实现农业合作化，会妨碍农民的团结，就是說，除了富农以外，富裕中农也会不满甚至反对我們，而支持我們的将只有比较贫苦的农民。这种观点也被事实驳倒了。由于我們对富裕中农采取团结的政策，对富裕中农入社的大农具和牲畜采取逐年偿还代价的政策，由于合作社生产的逐年上升，绝大多数富裕中农对合作化是基本上满意的。

总之，事实证明，我們紧接着土地改革之后“趁热打铁”，不停地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进行农业合作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好政策。如果我們在土地改革以后把革命停顿下来，让农村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发展起来，听任农民向两极分化，那在以后要实行合作化，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就会困难得多。

我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是怎样实现的呢？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而达到社会主义国有化的目的。一般說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是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供给原料、加工訂貨和統購包銷，对私人资本主义商业采取讓它們經銷代銷的办法；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由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一定年限內給資本家一定的年息。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問題上，我們党内也发生过一些不同观点的爭論。

有一种观点，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只应当加以利用，而不应当加以限制和改造，或者说我們限制得过多、改造得太急了。这实际上是企图让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保持下去。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在同一个社会中，不是这个战胜那个，就是那个战胜这个，长期并存是不可能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又是逐步改造，又是实行赎买，又給资产阶级选举权，又給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一定的政治地位，“太妥协了”。他們認為，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我們还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统一战线，是原則上不許可的。他們要求用对待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政策去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即沒收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或者从国民经济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简单的、迅速挤垮的政策，并且剥夺资本家的选举权。这些人忘記了，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的，这是马克思和列宁多次說过的。至于无产阶级专政並不一定要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的問題，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也講过：“限制选举权的問題是某一国家中实行专政的特殊問題，而不是专政的一般問題。”（注三）

我們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是不是采取了“阶级調和”的政策呢？当然不是。这种怀疑是完全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誤解或曲解。实际上，我們为

解决这个矛盾而采取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极其坚定的阶级政策，同“阶级调和”政策没有丝毫相同之处。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我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减少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并且在逐步改造的过程中有条件地利用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設的进行，而結果是我們能够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彻底地消滅资本主义，並且要把資產階級分子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当然也是完全适合中国条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好政策。

我們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并不象有些人所說的，拖长了改造的时间。相反，改造进行得很快。到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我們已經实现了农业的高级合作化，而紧跟着在一九五六年，就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与此同时，也实现了手工业的合作化。这就是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到七年的时间內，我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誰战胜誰”的問題。我們在解决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几乎完全沒有引起什么破坏，工农业生产一直是上升的。

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是結束了呢？有人認為是結束了，再不需要进行任何革命了。我們認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結束，还必須繼續进行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現在，我国的資本家還拿定息，在經濟上作为两个阶级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失。即使资产阶级在經濟上作为一个阶级完全消滅以后，资产阶级的世界觀，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而同社会主义制度相抵触。特別是资产阶级右派，还会利用这些情况，伺机向社会主义举行进攻，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有时他們的进攻还会达到非常猖狂的程度。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决不能局限于經濟战线上，还必須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这个著作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个問題。他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間，或者在知識分子中間，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馬克思主义仍然必須在斗争中发展。”（注四）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斗争象波浪的起伏一样，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表現尖銳，有时候比較緩和。这种斗争，要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影响最后消滅的时候，才会熄滅。

为了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对待和处理这两类矛盾，并且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鳴”的方針。在一九五七年，我們党发动了調整人民内部关系的全党全民的整风运动，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結果是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